

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一卷

西歐的衝擊與開國

信夫清三郎 著
周啓乾 譯



桂冠政治學叢書

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一卷

西歐的衝擊與開國

〔日〕信夫清三郎著

周啓乾譯

桂冠圖書公司

日本近代政治史／信夫清三郎著；周啓乾譯

--初版.--臺北市：桂冠，1990〔民79〕

冊；公分.--(桂冠政治學叢書；

18-21)

含索引

ISBN 957-551-137-9(一套：平裝).--

ISBN 957-551-138-7(第一冊：平裝)

1. 日本—歷史—近代(1600-1868)2. 政治—

日本

731.26

桂冠政治學叢書 10

日本近代政治史(一)

原 著／(日)信夫清三郎

譯 者／周啓乾

執行編輯／萬嘉玲

發行人／賴阿勝

出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話／3416949・3631407

電傳(FAX)／886-2-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印刷／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0年7月(印數：1~2,000)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定價／新臺幣250元

ISBN 957-551-137-9(套)

ISBN 957-551-138-7(第一卷)

凡 例

10

一、幕末維新時期的日本人有許多名字，但本書不拘其各個時期使用的名字，均用通稱。有時，像稱呼山內容堂那樣，不稱其豐信這個名，而只取其號。無固定原則。

二、在提及人物的姓名時，第一次必定列出全名，但是對於歐美人，為避免煩瑣，亦多僅用姓表示。全名及其拼音在卷末索引中列出，未列部分係不詳者。

三、編制索引時，對朝鮮和中國的人名、地名，除如廣東、上海等原來讀音相同者外，全按日文讀音標出^①。這是因為有的人了解原來的讀音，而有的人並不了解。

四、年號全用公曆和陽曆表示。陰曆和陽曆的對照，係根據日本外務省編《近代陰陽曆對照表》（原書房，1971年）。

五、在正文敘述中，引用資料以「」標出；在引文中，（ ）內的文字係所引原文之註釋，[]內的文字係作者之註釋。

六、為避免煩瑣起見，原則上不註明引用資料的出處。在論點中也吸收了許多研究者的成果，對此，除特殊情況註明者外，一般從略。

① 此譯本從略。

自序

1

本書是我把近代日本政治史作為通史來敘述的四卷本《日本政治史》的第一卷。本卷主題為西歐的衝擊與日本的開國。

本卷內容，敘述到新島襄^①逃往國外的事件為止。在我關於開國過程的敘述中，新島事件雖是這一過程的終點，但同時也是我進行分析的出發點。

福澤諭吉^②於 1860 年（萬延元年）和 1862 年（文久二年）隨同幕府的遣外使節分別訪問美國和歐洲，親身感受到西方的文明，便帶著有用的知識，作為啓蒙思想家而回到日本。他在 1856 年已繼承了戶主的身分，又於出外遊歷前後的 1861 年結婚，1863 年得長子一太郎。

新島襄為追求對基督教的信仰，於 1864 年（元治元年）乘黃昏自箱館^③逃離日本，偷渡美國。他在致其父親的信中，自稱為「不忠不孝之子」。其父害怕幕府^④追究，便聲稱他「為學習海軍而來到箱館地方，但同年六月（1864 年 7 月）離開該地不知

① 新島襄（1843～1890），日本明治時期的教育家，曾創建同志社和同志社大學。

② 福澤諭吉（1834～1901），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家，曾創建慶應義塾和慶應義塾大學。

③ 箱館，今函館。

何往，下落不明」，並以此爲由，廢除了父子繼承關係。

- 幕府自 1858 年（安政五年）至 1859 年已與歐美五國簽訂了
2 通商條約，把日本引向了開國的道路。儘管如此，爲什麼到了五年之後的 1864 年，新島襄仍不得不冒著被廢除父子繼承關係之險而逃離日本，前往美國留學呢？在明治時期，福澤諭吉和新島襄分別在東京和京都創辦慶應義塾和同志社這樣有代表性的私立學校，但他們兩人的命運却如此不同，這說明了什麼呢？對於福澤來說，認爲日本已經開國了，但對於新島來說，認爲日本不是仍然處於鎖國的情況嗎？這樣的話，所謂開國又如何解釋呢？本卷就是我自問自答的紀錄。

我的書桌上有兩本開國史。一本是研究維新史的史學家石井孝氏敘述有關日本開國史的著作《日本開國史》（吉川弘文館，1972 年版），另一本是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徐中約氏敘述有關中國開國史的著作《中國之加入國際社會》（Immanuel C. Y. Hsü,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 ~ 1880*.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把日本和中國之加入國際社會稱爲「開國」——正像本書所表明的那樣，不要說中國，嚴格說來，就連日本也不是「鎖國」，所以這種說法是不合適的，如果簡單地姑且稱之爲「開國」，那麼在石井孝氏與徐中約氏的著作中，不僅敘述的對象不同，而且在敘述開國史中所採取的方法亦有很大的差異。

石井氏把日本開國的過程作爲「通過以英國爲核心的世界資本主義而實現的世界市場形成過程中的一環」來加以觀察的，並

-
- 幕府，日本封建社會中掌握全國權力的軍事獨裁政權（1192～1867），首領稱征夷大將軍，這裏專指德川幕府（1603～1867），亦稱江戸幕府。

對「開國的歷史意義」概括如下：

「這樣，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為核心，在它的周圍還有晚些時候才確立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的美、德、法等國家，因而形成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它的下面，則有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商品銷售市場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經濟上的附屬國。這就是我國開國時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日本的開國，意味著日本被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第3頁）

這樣，石井氏在《日本開國史》中便從「世界資本主義與日本 3 的開國」談起，正文中的敘述，始於美國軍艦來航、締結美日親善條約，迄於決定日本開國的與五國之間簽署條約，最後雖然展望了「開國與國內形勢」，但他概括了開國的過程後得出如下結論：

「開國具有使日本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而開放的歷史意義。這個過程始於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⑤來航，安政元年（1854年）締結美日親善條約，經過安政五年（1858年）與五國締結通商條約，至安政六年予以實施，遂趨於完成。」（第387頁）

徐中約氏是怎樣敘述這個問題的呢？中國的開國史與日本的開國史有許多不同之點。如果說，使日本走上開國道路的是「黑船」的威力，那麼使中國開國的則是鴉片戰爭和亞羅戰爭（第二

⑤ 黑船，十六、七世紀，葡萄牙、西班牙等國船隻來到日本，因船身大多漆為黑色，故名，此後相沿成習，對來自歐美各國的船艦通稱黑船，直至江戶時代末期。這裏專指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率艦來日。

次鴉片戰爭)這樣實際的戰爭。如果說,日本是通過親善條約和通商條約這兩個劃時代的條約而實現開國的,那麼中國則是由結束鴉片戰爭而簽訂的南京條約而一舉開國,並由結束亞羅戰爭而簽訂的天津條約使這一開國更為充分和完善。這樣,中國和日本由於相繼與西歐各國締結了天津條約和通商條約(五國條約),就大體上步調一致地實現了日本的開國與中國的開國。徐氏所敘述的就是以締結天津條約為中心的中國開國史情況,其特點則在於重點敘述中國之「加入國際社會」這一締結天津條約的結果。徐氏在其所著《中國之加入國際社會》一書的第一頁上這樣開始寫道:

國際社會(family of nations)這個名詞具有比喻世界上的國家共同體的特點。在今天來說,它雖然與整個國際社會大體上是一個範圍,但在當初,却只相當於1648年簽署威斯特發里亞條約●的一批西歐基督教國家而已。國際社會的特點是它不斷地

- 4 從西歐膨脹開來。這個過程在初期的明顯例證是,它於1721年把俄羅斯帝國包括進來,於1783年把美國包括了進來。在十九世紀,根據1856年巴黎條約●的明確規定,隨著土耳其的加入,它便侵入到世界上的非基督教地區了。當西歐的國際社會發展到遠東的時候,它便面臨了在中國領導下的另一國際社會(another family of nations)。在這兩個互相排斥的秩序(these two mutually exclusive systems)之間,便發生了衝突,結果便是中國的秩序被相繼侵入的西歐秩序所吞食。我打算進行的這個研究,就是從這個設想出發的。

●威斯特發里亞(Westphalia)條約,於1618至1648年的歐洲三十年戰爭後簽訂,它重新劃定歐洲大陸各國的邊界,開創了由國際會議解決國際問題的先例,並建立了歐洲新的國際均勢。

●巴黎條約,於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後簽訂。

徐中約氏的著作名爲《中國之加入國際社會》，石井孝氏的著作則名爲《日本開國史》。如果對這兩書直接加以比較，對作者自不免有失禮之嫌；但如果我是爲了研究日本的開國史，從如何接受和運用他們的精心著作這一角度出發，則進行一定的比較也還是必要的。問題在於石井氏的方法，石井氏把日本的開國當作爲「通過世界資本主義而實現的世界市場形成過程中的一環」來看待。因此，對於石井氏來說，日本向世界市場「開放」和被「納入」世界市場，才是問題的所在，因而由於日本已向世界市場「開放」和被「納入」了世界市場，所以日本開國的過程便也就「結束」了。開國的主體是「世界資本主義」，日本則是被「納入」的對象。從日本來看，被「納入」是不是就是「結束」，換言之，無論日本是否以其本身爲主體而「加入國際社會」，這些都不是開國史上的主要課題。世界資本主義的商品自由流入日本，日本成爲世界資本主義的市場，這固然成爲開國史上的主要課題，但日本的商品是否能夠自由開闢國際市場，則又不是開國史的主要課題了。世界資本主義商人爲開闢日本市場而來到日本，爲了保護他們，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便派來了公使和領事，這雖然成爲開國史上的主要課題；但日本商人爲開闢世界市場，在日本與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自由往來，爲了保護他們，日本政府派出公使和領事，這即又成爲開國史上的主要課題了。那麼，這樣的開國史也能算是一部好的開國史嗎？

如果說，根據五國條約使「日本作爲世界資本主義的市場而 5
開放」，儘管如此，五年後新島襄却又碰上這種局面，即他如果
不想辦法逃往國外，就不能實現其留學美國的願望，換言之，對
新島來說，日本仍然處於鎖國狀態，那麼，竟把「日本作爲世界
資本主義的市場而開放」當作開國過程的「結束」，不就是毫無
道理了嗎？至少，日本對於福澤諭吉來說是開國，而對新島襄來
說却不成其爲開國，那又怎麼能把日本開國的過程說成是已經

「結束」了呢？對這個矛盾解釋清楚，不正是日本開國史上的主要課題之一嗎？對這矛盾清楚解釋的方法，不正在於把石井孝氏敘述日本「開國史」和徐中約氏敘述中國「加入國際社會」的觀點，作為研究開國史的方法而加以綜合和統一起來嗎？我在本卷的敘述中，就是以這種對於日本開國史的方法上的回顧而展開的。

徐中約氏指出，中國之加入國際社會，伴隨著中國由過去的「儒教的世界帝國」(Confucian universal empire)變為「近代的民族國家」這一發展過程。儒教的世界帝國所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是「華夷秩序」。與華夷秩序相反，日本德川幕府建立的秩序則是東洋學學者中村榮孝氏在其大作《日朝關係史》(三卷，吉川弘文館，1970年版)所指出的「大君^⑤外交體制」，本卷學習中村氏，把這個概念的表述與「華夷秩序」中的「秩序」一致起來，稱之為「大君外交秩序」。日本在古代曾經從華夷秩序的旗幟下獨立出來，具有這種歷史的影響，儒學作為德川幕府官方所許可的意識形態，也帶有華夷觀念而具有影響，這樣，在理解大君外交秩序時，就要以理解華夷秩序與華夷觀念作為不可缺少6的前提。然而，本卷在敘述大君外交秩序之應付西歐的衝擊時，對華夷秩序應付西歐衝擊的情況也略作詳細的論述，這不僅是為了更清楚地將大君外交秩序與華夷秩序分別對西歐衝擊所採取的不同態度加以比較，而且想在日本與中國之不同的應付中，發現解決當年「工廠手工業論爭」的關鍵。

工場手工業的論爭是圍繞著歷史學家服部之總氏於1932年把幕末日本的發展階段規定為馬克思《資本論》中所說的「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⑥而發生的論爭。服部氏在1947年發表的《日

⑤ 大君，一般對日本天皇的敬稱，但這裡指德川幕府的將軍。

⑥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3頁。

本史上的世界與世界史上的日本》那篇論文中，這樣概括的把幕末的日本規定為工場手工業時代的想法：

「……當我們從一國社會物質生產發展階段的高低這一點來理解時，與十九世紀初期「黑船」來航的幕末日本處在同一時代的朝鮮和中國，其情況並不相同。我認為其不同點是，日本在天保^①時期——1830年代就已進入馬克思所說的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嚴格意義的工場手工業時期，而中國進入這個發展階段，則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前夜——1890年代的事。中日兩國雖然由於南京條約和安政條約的簽訂，在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實現了「開國」，但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前靠自己的力量修改了不平等條約，因而能處於如〔岡倉〕天心^②所說的「誠可謂自己取得獨立」的「唯一古老帝國」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國這個古老帝國則處於不斷的衰敗中，其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即使這兩者所處地位的差別由於甲午戰爭又有了新的決定性的擴大則另當別論，恐怕只能從「黑船」來航時期兩國處於上述發展階段上的差別來加以說明，當年我在歷史學上關於幕末為工場手工業時期的主張，實際上正是這個觀點。」（《服部之總全集》，第10卷，1974年福村出版，第97～98頁）

問題在於如何說明中國和日本是在「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實現開國的。如果把中國和日本的開國作為石井孝氏所謂的「通過世界資本主義而實現的世界市場形成過程中的一環」，並從這一抽象的意義來看，倒也可以說兩者是處於「完全相同的情況 7 下」。但是，兩者並不相同，第一，中國（清朝政府）和日本（德川幕府）對待西歐的衝擊所採取的不同態度，早在簽訂南京

① 天保，日本仁孝天皇年號，時當公元1830至1844年。

② 岡倉天心（1862～1913），曾任東京美術學校校長，並創建日本美術院，著有《東洋的理想》、《日本的覺醒》等。

條約與安政條約的「黑船時代」以前的十八世紀末就已經表現得清清楚楚；第二、兩者態度不同之原因，並不在於兩國經濟是否進入了工場手工業階段這一「發展階段上的差別」，而是在於面臨西歐之衝擊的兩國的體制與秩序——華夷秩序和大君外交秩序——的不同。中國和日本在開國以後所走的道路迥然不同，中國成為西歐各國的「食餌」，而日本則能避免成為其「食餌」，其「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在於面臨西歐之衝擊的所謂華夷秩序與大君外交秩序，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制和秩序，在於這大君外交秩序先於華夷秩序而迅速採取近代化——由歐化而實現近代化——的政策。一度成為「食餌」的中國，在1931年至1945年與日本帝國主義所進行的十五年戰爭中取得了勝利，恢復了「誠可謂自己取得獨立」的自由，而一度曾把這個「不斷衰敗的古老帝國」當成「食餌」的日本，則在十五年的戰爭中遭到失敗，名譽掃地，追溯其原因，也與其對西歐的衝擊所採取的不同態度以及實行近代化的作法有關^①。我在本卷中，一直上溯到十八世紀末

- 「學者們「科學地」論證了中國在近代文化方面如何落後於日本的問題，也可以說是確立了科學的輕蔑感，以代替那樸素的輕蔑感。」「中國的近代文化與日本相比，表現出不同之點。」「關於這一點，丸山真男所著《近代日本思想中的國家理性》（《展望》1949年1月號）一文在方法論上對我亦有啓發。……他在論及中國的近代化所以落後於日本的原因時，曾舉出華夷思想這個概念，他認為，由於中國的華夷思想是固有的，所以大大妨礙了國家理性的產生，而日本則不然，由於它的思想是從中國借來的，所以不僅這種思想的抵制本身是軟弱的，而且相反它卻還可以轉化為確立近代理性的槓桿。我以為，這是卓越的見識，它使過去為人們所忽略的東洋近代化問題增添光輝。然而，我仍有不滿足之處。丸山雖然從意識形態方面圓滿的解釋了中國在近代化方面落後於日本的原因，但我認為，他還只是把這個落後僅做為一般的落後來對待，

葉，詳細敘述華夷秩序與大君外交秩序如何對待西歐的衝擊問題，目的在於想要解決曾與我多少有些關係，因而也就負有一定責任的工場手工業的論爭問題，以履行自己的這一職責。

我躋身學術界已四十餘年，爲了對從事學問的一生作一清算，便開始寫作本書，只是感到自己積累所得的知識仍然太少。有好多位先生關心我的研究工作，至今仍得到他們的盛情關懷。我對各位的盛情關懷表示衷心感謝——這些感謝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並將本書獻給讀者，希望得到批評指正。

信夫清三郎

1976年5月18日

而沒有觀察到時間的差別同時還包含著質的差別。把後進國的近代化過程與歐洲明確地加以區別，這種作法當然比過去那種教條的唯物史觀論者要高明得多，但他不是還忽略了同屬後進國類型的日本與中國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別嗎？」「與此相對照，我想起了約翰·杜威的中國觀。……與丸山使用華夷思想這個概念一樣，杜威也採取了同樣的說明方法，但不同之點在於，杜威以爲中國的近代化雖然在時間上落後了，但同時却使其在質的方面占了優勢。他在1918年就已經認爲，中國儘管在各方面有其落後性、混亂與軟弱，但在爲西方近代思想所滲透這一點上，却遠遠超過了日本。」「爲什麼中國近代化取得成功，而日本却失敗了呢？……」（竹內好：《日本與亞洲》《竹內好評論集》第3卷，筑摩書房，1966年，第57～62頁）。——原註

譯者的話

本書作者信夫清三郎，1909 生，1931 年入九州大學法學部學習，曾受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服部之總的指導，研究日本外交史，並於 1934 年出版《中日甲午戰爭》一書，揭露了日本資產階級和軍閥政府的反動本質，當時即遭日本法西斯主義政府的禁止。1934 年大學畢業後，參加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術團體唯物論研究會，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參與編輯《歷史科學》、《歷史》等刊物。1937 年，與服部之總合著《日本工場手工業史論》和《明治染色經濟史》。1938 年 11 月，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的嫌疑」被日本反動政府逮捕。次年出獄後，他繼續從事歷史研究，於 1941 年出版《後藤新平》，1942 年出版《近代日本外交史》和《日本產業史序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擔任產業勞動調查局理事長，並講授日本經濟史。1950 年擔任名古屋大學法學部教授，至 1973 年退休。其間曾出版《明治政治史》、《大政政治史》、《大正民主史》、《安保鬥爭史》、《戰後日本政治史》、《日俄戰爭史研究》（合著）等書，並於 1964 年任日本政治學會理事長。

信夫長期從事日本政治史和外交史方面的研究，具有較深的造詣，有很多著作。1974 年出版的《日本外交史》（合著），是他畢生從事日本外交史研究的結晶。他在書中熱情歌頌中日友好，歡迎兩國恢復邦交，對中國人民表達了友好的感情。

本書是作者在已經出版的幾部關於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史的

基礎上，對多年來研究成果進行了概括和總結，運用材料比較豐富，分析也比較客觀。全書共分四卷，重點敘述日本近代以來的政治史。第一卷以十七世紀初至十九世紀中葉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為背景，闡述了日本封建社會後期經濟的發展與階級矛盾的激化，涉及內政、外交和思想等方面，並揭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強制打開日本大門，使日本面臨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此外，在敘述中還注意聯繫中國的情況，與日本加以比較，並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書中的一些分析雖然尚可進一步探討，但全書畢竟可作為我們研究這段日本歷史的有益參考。

本書第一卷根據日本南窗社 1976 年 11 月版譯出。為讀者方便起見，譯者作了必要的注釋，並保留了書後的索引，還對索引中的日本人名等用拉丁字母試注了日本讀音。由於譯者水平所限，在譯文、注釋和注音中錯誤在所難免，懇切希望得到批評和指正。

周啓乾

目 錄

9

凡例·····	1
自序·····	1
譯者的話·····	1
第一章 鎖國·····	1
第二章 西歐的衝擊·····	67
第三章 內憂外患·····	135
第四章 開國·····	209
第五章 攘夷·····	295
索引·····	367

第一章 鎖 國

3

傾我國所產足以流傳萬代寶貨，
而易來自遠方一時之奇技淫巧，因此
貨利之事而致損我國威，竊以爲實屬
不當。

——新井白石：《欽柴記》

正當英國實現了光榮革命①的 1688 年時，中國的清朝是在聖祖（康熙帝）的統治之下，而日本則是在德川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的統治之下。關原之戰②發生於 1600 年，德川家康成爲征夷大將軍而在江戶③開設幕府，是在 1603 年，所以德川幕府的統治到這時已將近一個世紀了。清朝滅亡明朝，進入北京，是在 1644 年，因此清朝的統治到這時也快半個世紀了。建立幕府達一個世紀的日本和建國半個世紀的清朝，分別迎來了元祿④和康熙這樣富於創造性的時代。

幕府對大名⑤的控制和對人民的統治，看起來似乎還沒有絲

① 光榮革命，指 1688 年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發動宮廷政變，最終確立了君主立憲制的資產階級專政。

② 關原之戰，德川家康打敗石田三成，是德川氏推翻豐臣秀吉政權的關鍵一仗。關原位於今岐阜縣西南部的不破郡，是京都的門戶。

③ 江戶，今東京。

④ 元祿，日本東山天皇年號，時當公元 1688 至 1704 年。